



▲以《紅樓夢》中的大觀園為原型設計而成的上海大觀園。

中國傳統建築與文學

中國傳統建築與文學有著奇妙的關聯。建築中豐富多樣的文學語言，寥寥數語便能突破建築表現的局限，達到意與境的統一，並與建築相得益彰，形成別具一格的傳統文化景觀。這種關係，為審視和理解中國文化和審美觀念，提供了獨特的視角，值得當代文學家與設計師共同思考。

文學如何疊加於建築

建築重物質，文學重精神，分處藝術的兩極。兩者看似毫不相干，卻有著奇妙的關聯。對比中西方傳統建築，我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：文學在建築上的疊加，在中西方建築體系中是不均衡的。

西方建築中大量引入雕塑和繪畫，只有少數紀念性建築中刻有一些文字，內容又常常是記敘性的，作為對雕塑、繪畫的補充。而中國傳統建築在上千年的建築實踐中積累了豐富多樣的疊加經驗，創造了楹聯、匾額、招幌、牌坊、碑碣、摩崖、刻石，以及各種嵌板刻字、紋樣紋飾等品類齊全、形式多樣的疊加方式，形成了獨特的文化景觀，不僅強化了建築意境，而且增加了建築的生命力。這些建築中的文學基因，無論從數量、質量上，還是廣度、深度上，均遙遙領先於其他建築體系。

這種獨特的文化現象形成，絕非偶然，而是根植於厚重的中國傳統文化。「語言學之父」索緒爾曾公開讚歎：「漢字是我所見過，全世界最美的文字之一。」中國傳統建築中文學語言的大量疊加，與漢字獨特的個性密不可分。漢字作為一種表意性文字，具有長於表意、文法自由、書寫靈活、高度藝術化的特點，恰好可以彌補建築作為一種具象藝術，難以表述語義的欠缺，兩者聯袂呈現，創造了意蘊無窮的想像空間。漢字的書寫藝術——書法的加持，更是為文學融入建築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外形條件。篆書、隸書、草書、行書、楷書，各有風韻，篆書敦圓蒼茫、隸書工整精巧、草書瀟灑奔逸、行書流動自如、楷書清麗娟秀，可根據建築需要，因時因地靈活融入。漢字這種獨特的意象美和形式美，為文學融入建築創造了條件。

中國傳統社會崇文重教。一批又一批才華橫溢的文人雅士，把創作激情投向自然、歷史、人文，當然也包括建築。他們登高望遠，往往「遊目騁懷、胸羅萬物」，引發對人生的感悟和思索。這些文人騷客、士族階層，創作了大量膾炙人口的文學名篇，甚至身體力行，直接參與建築營造，建立了文學與建築的耦合性，為文學融入建築創造了主體條件。

王羲之的名作《蘭亭集序》，書法造詣固然無與倫比，然而，許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它體現出的造園思想，絲毫不亞於書法。「此地有崇山峻嶺，茂林修竹，又有清流激湍，映帶左右。引以為流觴曲水，列坐其次，雖

無絲竹管弦之盛，一觴一詠，亦足以暢敘幽情。」於是，曲水流觴成為中國山水園林的營造範式，流傳至今並傳播出海。

相比於其他建築，「土」介入程度最深，取得成就最大的傳統建築，是園林建築，就連「園林」一詞，也源自詩作。早在西晉張翰的《雜詩》中，就有「暮春和氣應，白日照園林」一說，從此以後，園、苑、圃等建築稱謂逐漸被「園林」一詞替代，並傳播到海外，成為中國式山水建築的通用叫法。英國園藝學家歐內斯特·亨利·威爾遜，曾著書《中國：世界園林之母》，記錄了他在中國考察的見聞，其中開宗明義地提出了「中國乃世界園林之母」的觀點，得到世界園藝界的廣泛認同。

園林建築是在文人的直接參與下營造的，從一開始，就自帶詩情畫意的文學基因。白居易建造了履道裡宅園，和它相距不遠的，是唐朝名相裴度的集賢裡莊園，兩人為同道中人，因而「履道集賢來往頻」，「百餘步地更相親」。

王維建造的輞川別業，可以說是唐代最出名的「民宿」，這是一個集住宿、餐飲、採摘、垂釣、遊覽於一體的多功能休閒莊園。王維還專門寫了一本詩集——《輞川集》，介紹自己的別墅之景。王維同母親在輞川別業生活了14年，且俱終葬於這綠水青山環繞的風水寶地。唐中期名臣李德裕設計的平泉山居，是他的心靈家園，他一生遺留的數百首詩中，有八十幾首提到平泉山居，足見該園在他心中的位置。後來，有些文人乾脆「跨界下海」，成為職業的造園師，如明代杭州的陸豐山，上海縣的張南陽、松江的張南垣，以及著名的造園家計成、李漁等。其中上海豫園出自張南陽之手。張南垣生養四子，都能傳父術，其中張然最為知名，曾被聘為清朝皇家總園林師。

不同於西方建築的單體性特點，中國傳統建築自一開始就不是以單體建築為目標，而是將亭台樓閣、館軒齋室等多樣化的建築單體，相互連接配合，形成具有強烈時間感和序列性的建築群體，宛如一幅在大地上徐徐展開的畫卷，其中的空間起承轉合、動線曲折迂迴，人在其中行走，達到峰迴路轉、移步異景的體驗。這種時間感和序列感，使文學語言在建築上可以得到主次分明、清晰流暢的表達，為文學融入建築創造了得天獨厚的物質載體。



▲武漢黃鶴樓內楹聯：爽氣西來，雲霧掃開天地憾；大江東去，波濤洗淨古今愁。

文人加持 建築生輝

建築是文人墨客抒發情致的重要載體，縱觀中國歷史，不乏描寫建築的名篇，它們賦予建築意蘊風采，使之名揚四海。建築經文學浸潤後產生的傳播效應甚至超過了建築藝術本身，成為一種文化符號。中國古代「四大名樓」——鶴雀樓、黃鶴樓、滕王閣、岳陽樓，最能說明這種關係。

公元653年，位於江西洪州（今南昌）的滕王閣竣工，起初並沒有多大名氣。直到公元675年，洪州都督閻伯嶼在滕王閣大宴賓客，少年才子王勃應邀赴宴，他當場寫下《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》（即《滕王閣序》），震驚四座。其中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」、「物華天寶」「人傑地靈」、「漁舟唱晚」「雁陣驚寒」等名句，很快傳揚八方，滕王閣之名連同其區位、形制、建築形態，也隨之傳遍四海。可以說，是這篇知名駢文成就了滕王閣的聲名。甚至在它問世後的1000多年間，經歷了屢毀屢建，直至1989年第29次重修，重建者仍然以《滕王閣序》為參照進行選址、建築造型、內部佈局和細部裝飾，足見在世人心目中，這篇名作已經成為滕王閣的靈魂，任時光流轉，亘古不變。

與滕王閣一樣，四大名樓中的其他三座，也因文學而聞名遐邇。

「昔人已乘黃鶴去，此處空餘黃鶴樓。黃鶴一去不復返，白雲千載空悠悠。晴川歷

歷漢陽樹，芳草萋萋鸚鵡洲。日暮鄉關何處是？煙波江上使人愁。」崔顥的《黃鶴樓》是一篇傳誦千古的詩歌，得益於名作的傳播效應，黃鶴樓早已成為兩江歷史重鎮武漢的地標建築和城市符號，遊人必去的打卡之地。

朗朗上口的《登鸕雀樓》老少皆知，「白日依山盡，黃河入海流。欲窮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。」詩作散發出強烈生命力，已然成為鼓舞人們奮發進取的名句。

而岳陽樓的生命，早已與范仲淹的《岳陽樓記》深度捆綁。范仲淹藉岳陽樓抒發自己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的廣闊胸懷，在人們傳頌他的千古名句，感歎他那博大、曠達、高逸的胸襟的同時，也激發了對岳陽樓這座建築由衷的嚮往，使之終成一代名樓。

紹興蘭亭，本為一座寂寂無名之亭，王羲之等人在此舉行禊祓活動，曲水流觴，飲酒作詩，王羲之寫下了《蘭亭集序》，使得蘭亭名傳至今。

「月落烏啼霜滿天，江楓漁火對愁眠。姑蘇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鐘聲到客船。」張繼的《楓橋夜泊》情景融合，美得像一幅山水畫。

這首詩使蘇州寒山寺成為蘇州十景之一，每到新年，都有大量中外遊客到寒山寺敲鐘，懷古祈福。

楹聯與匾額

文學與傳統建築的疊加，形式靈活多樣，內涵豐富多變，其中尤以楹聯和匾額最有特色。

「楹」指古建築明間前部門前的兩根柱子，「聯」指聯句或聯語，是由兩個工整的對偶句構成的獨立語句，其本質特徵是對仗。楹聯是懸掛在傳統建築楹上的聯句，集文學、書法、篆刻藝術於一身。

曹雪芹在《紅樓夢》中藉人物之口說道：「偌大景致，若干亭榭，無字標題，任有花柳山水，也斷不能生色！」指出楹聯是山水景致的生色之筆。清末楹聯家吳恭寧曾道：「山川祠宇，非藉文人之題詠，即名勝亦黯然寡色。」將楹聯的作用提到相當的高度。中國園林建築是在文人的直接參與下營造的，一開始便帶有詩情畫意的色彩，好的楹聯，可以起到點題立意、情景交融的作用，成為「景眼」。

黃鶴樓前廳正門柱上的楹聯，是清朝臣張之洞所題，此聯氣勢磅礴，雄渾豪邁，將該樓從漢晉到唐宋間的興廢歷史和憑弔留墨都納入句中。遊人到此，駐足謳聯，心曠神怡之感油然而生，達到了「景以典故生色，典故因景長存」的互洽效果：爽氣西來，雲霧掃開天地憾；大江東去，波濤洗淨古今愁。

明代是楹聯普及的重要時期。明朝的幾代皇帝、官僚以及知名文學家、書畫家，大都是楹聯家，如朱元璋、朱棣、徐達、解縉、于謙、沈周等，其中開國皇帝朱元璋更被稱

為「楹聯天子」。

清代的楹聯則突破了以五言、七言為主的格律詩的框架，吸收散文的特徵，字句漸多的長聯創作愈發爐火純青。長聯博采詩詞曲賦之長，靈活性更勝一籌，成為文人表情達意的重要形式。清代聯家輩出，他們中有政治家、文學家、書畫家，大多詩書皆精，集多藝於一身。如康熙、乾隆、李漁、王夫之、蒲松齡、鄭板橋、孫髯、曹雪芹、袁枚等。

匾額，是懸掛在傳統建築門屏上，反映建築物名稱、表達義理情感之類的牌匾，集字、印、雕、畫為一體，被譽為古建築之目。中國傳統建築強烈的象徵性，是世界建築體系中少有的，而匾額恰是詮釋這種象徵性的神來之筆。

故宮中軸線上的太和、中和、保和三大殿，空間構圖意為突出至高無上的皇權，並以匾額題名加以強化。

「太和」「中和」「保和」出自《禮記·中庸》和《易·乾卦》，意指宇宙萬物和諧，各得其利，如此命名，是為了表達皇權至上、長治久安的象徵意義。

而後三宮中帝后居住的「乾清宮」「坤寧宮」匾額，出自《易·序卦》：「乾，天也，故稱呼父；坤，地也，故稱呼母。」「乾清」和「坤寧」象徵著天地、陰陽、父母，包含著天清地寧、統治永久的用意。

作者 / 張軍利

本版圖文均據北京《光明日報》



▲中國古代「四大名樓」：岳陽樓（左上）、黃鶴樓（左下）、鶴雀樓（右上）、滕王閣（右下）。